

◎ 陶纪明 著

上海生产者服务业的 空间集聚

Shanghai

Shengchanzhe Fuwuye De

Kongjian Jiju

◎ 陶纪明 著

上海生产者服务业的 空间集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生产者服务业的空间集聚/陶纪明著. —上海: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5432-1640-2

I. 上… II. 陶… III. 服务业-研究-上海市 IV. F7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3109 号

责任编辑 忻雁翔
美术编辑 路 静

上海生产者服务业的空间集聚
陶纪明 著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格致出版社
www.ewen.cc www.hibooks.cn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24层)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4.25
插 页 2
字 数 207,000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2-1640-2/F·196
定 价 30.00 元

Abstract

Enterprise space clusters have received the economist and geographer's widespread attention since 1980's, while research on the service enterprise clusters has been a significant part of it. The intrinsic attributes of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 determines that the city became naturally its breeding ground; therefore, most research proceeds based on the city space background. These researches include the features and evolvement of these service producers' cluste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lusters and city space, and the impact of the clusters on the city functions, etc. All above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metropolis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rather than the ones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 few researches in China do deal with metropolis, such as Shanghai, Beijing, Guangzhou and Shenzhen.

This paper takes Shanghai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 space as the object of study. After a simple introduction of the nature, function and its growth practice in the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of the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 (second chapter), I review and analyze in the third chapter the theory in the clusters of the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lusters, and its evolvement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These two chapters are the foundations of theoretical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The fourth and fifth chapters respectively conduct empirical study and comparative analyse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vement path of clusters in Shanghai finance, attorney, accountant, advertising, foreign invested physical distribution by shipping, computer software, international trade, real estate and other commercial service industry. From the angle of industrial space and spatial industry, following above research, the first section of Chapter 6 describes the overall features of clusters of Shanghai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present these features through the Gini coefficient; then, the second

section of Chapter 6 perform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industries from the angle of clusters and concentration respectively; the third section of Chapter 6 conducts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spatial features of three types of space (CBD, downtown area and the periphery region), and comments the function and nature of these three types of space. The seventh chapter concludes this paper and presents an extended analysis 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 stud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luster of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 and the globalization, city space as well 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function.

第一章 导论 /001

第一节 研究的意义及目的 /001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004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015

第二章 生产者服务业的性质及其在国际大都市的增长 /021

第一节 生产者服务业的性质及其功能 /021

第二节 国际大都市生产者服务业的增长 /030

第三章 大都市区生产者服务业的空间集聚——理论与实践 /047

第一节 国际大都市生产者服务业空间集聚的理论研究
/047

第二节 国际大都市生产者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实证研究
/059

**第四章 上海生产者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实证研究——金融业、律师
业、会计师业和广告业 /072**

第一节 上海金融机构的空间分布及其演变 /072

第二节 上海律师事务所的空间分布及其演变 /083

第三节 上海会计师事务所的空间分布及其演变 /090

第四节 上海广告企业的空间分布及其演变 /094

第五节 上海金融机构、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区位选择的
调查问卷分析 /101

第五章 上海生产者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实证研究——基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分析 /115

第一节 关于数据的一些说明 /115

第二节 各种类型的生产者服务业的增长 /119

第三节 航运服务业的空间分布及其演变 /124

第四节 商务服务企业的空间分布研究 /130

第五节 其他几类生产者服务业的空间分布 /137

第六章 上海生产者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实证研究——从空间集聚到集聚空间 /145

第一节 上海生产者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度研究 /146

第二节 上海生产者服务业的行业特性分析——空间视角 /159

第三节 上海生产者服务业的集聚空间研究——行业视角 /165

第七章 上海生产者服务业空间集聚的拓展研究 /183

第一节 上海生产者服务业空间集聚的总体特征分析 /183

第二节 上海生产者服务业空间集聚与城市空间结构 /191

第三节 上海生产者服务业空间集聚与城市功能转型 /204

参考文献 /212

后记 /220

第一节 研究的意义及目的

一、研究的背景

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与分散长久以来一直都没有引起主流经济学的重视,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认为这是一种“令人费解”的现象(藤田昌久等,2005)。但纵观经济理论的发展历史,空间或者说区位概念其实并没有完全游离于经济学家的视野之外,之所以没有“登堂入室”,其原因有二:一个是技术原因,即经济学家长久以来一直都不能把“规模报酬递增”假设同“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假设很好地相容,也就是说,不是经济学家没有看到“规模报酬递增”的重要性,而是这一现象在数学上“太难驾驭了”(藤田昌久等,2005)。我们知道,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规模报酬递增,则企业的集聚现象就难以在数学逻辑上得以阐释。另一个原因是自经济学诞生之日起,价格理论一直都是经济学理论最核心的部分,在构架抽象的价格理论体系的过程中,经济学家不得不舍象掉许多重要的影响资源配置的因素,比如时间、空间、制度、行为、信息等。随着新概念、新理论的不断提出、完善以及数理应用的发展,我们看到,那些曾经被舍象掉的因素开始逐渐进入到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去,比如加入时间使得经济分析具有了动态性;加入行为因素,产生了有限理性基础上的理性预期假说;加入信息因素,产生了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条件下的新的均衡解;而交易成本概念的提出也进一步把制度因素从一个不可度量的抽象实体变成一个可度量的经济学变量,至少新制度经济学家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的。我们看到,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完全符合我们对复杂事物的认识规律,

即由高度抽象到逐步放松假设条件,以一步步逼近和还原事物的本来面目。

当条件具备以后,空间概念也开始被引入到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内,以克鲁格曼、藤田昌久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这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建立了多个模型来描述和解释经济体产生空间集聚和分散的条件及其演化的路径。尽管取得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成果,但遗憾的是,该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农业—工业体系的空间均衡问题,服务业是被排除在外的。另外,在该类研究中,“空间”这一概念的范围是无穷大的,城市本身是最小的空间单位,因此城市内部的产业集聚和分散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服务业没有进入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相比较而言,农业—制造业更具有同质性和单一性,运用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以及规模经济理论基本上就可以对该类企业的空间优化问题进行一般均衡分析。但服务业的性质要复杂得多,我们很难用一两个简单的变量来对其空间的最优策略进行刻画。典型的如生产者服务业,按现有的通常解释,它对成本不敏感,但对“面对面”(face to face)交流的要求却非常高。很显然,由“面对面”引发的诸如隐性知识的扩散、信息的可得性、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的人际关系网络等重要的解释因素,其为生产者服务企业所带来的效用是很难被数量化的,即便是引入,我们也不能有效地处理从而无法求得其均衡解。而进一步的研究又发现,生产者服务业不同行业之间,同一行业内承担不同职能的部门之间以及同一行业内不同规模、不同市场导向的企业之间在空间上的集聚与分散特征也是不同的,甚至是大相径庭的。显然,用一两个模型是无法包容和反映如此丰富、如此多元的企业最优选择的,尽管主流分析范式在这一领域也进行了一些初步的尝试和探索,比如 Ota 和 Fujita(1993)建立的两部门模型可以用来分析同一企业内部不同职能部门的空间优化问题,O'Hara(1977)用交通成本来研究企业在 CBD 内的分布问题。总体而言,主流分析范式在这一领域还没有成为研究的主导力量。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目前对生产者服务业空间集聚的研究仍停留在一个较为初级的阶段,经济学家,也包括部分地理学家,通常采用的仍然是传统的实证—归纳—假说—检验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之所以被视为初级(至少主流经济学家是这样看的),是因为由此得出的结论在逻辑上是不严密的。正如卡尔·波普所指出的,无论你找到多少只白天鹅,你都不能证明“天鹅是白的”

这一命题是正确的。

尽管存在上述的种种困难,生产服务业的增长和集聚现象仍然引起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们的广泛关注,大量的文献不断涌现,并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形成一股热潮。这些研究对于我们深刻地认识生产者服务业的产业特征、城市的功能及其转型,城市的空间结构及其演化,城市的层级及其相互作用,以及城市发展规划和发展政策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都产生了积极甚至是重要的影响。

二、研究的意义和目的

生产者服务业的增长及其集聚是最近几十年来发生在国际大都市内部最为重要的经济现象之一。尽管理论界已经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总体上,仍然是局部研究多于整体研究,经验分析多于理论抽象,成熟市场化国家的国际大都市的研究多于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中国际大都市的研究。因此,作为一个尚未成熟的、以假说为主的研究领域,还需要大量新鲜的个案研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个案研究补充进来,以夯实该类研究的实证基础,拓展该研究的覆盖范围,从而进一步提升理论的抽象水平。

本书以上海这一正在崛起中的国际大都市为研究对象,一方面可以为上述研究增加一个有重要代表性的案例;另一方面,通过观察崛起中的国际大都市生产者服务业的空间分布及其演化特征对于深入理解生产者服务业的性质、内涵和增长动力,理解生产者服务业如何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调整和展现自身,理解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与城市功能的转型和重塑之间的互动关系,都是一个很好的切入视角。因为崛起中国际大都市的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正处于全面展开和深入推进的过程中,其在全球城市网络中的地位和功能也正处于一个动态的调整过程中,各种矛盾和相互作用往往表现得更为鲜明。特别是在把上海的实践进行纵向比较,以及同成熟的国际大都市的发展经验进行横向比较的基础上,可以对已经形成的较为成熟的关于空间集聚的理论进行证实或证伪,通过这种全面的比较分析和实证检验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的内在规律,进而通过对这种规律的把握来指导上海这样的崛起中的国际大都市的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城市功能的重塑。

本书研究生产者服务业的空间集聚有如下两个目的:其一,通过其空间集聚的形态以及变迁的内在规律,可以从另外一个维度和视角对生产者服务业的性质及增长的动力作深入剖析。不同的生产者服务业的性质是不同的,相应地,这种差异性也必然在其全球、区域乃至城市内部的空间分布上表现出来。特别是,这种研究对于深入理解生产者服务业同一行业的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功能差异性有很强的启示性,比如:功能性更为强大的职能部门与简单的职能部门在空间分布上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随着城市功能的进一步拓展,特别是随着其融入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的进一步展开而逐渐鲜明地表现出来。其二,生产者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可以视为城市功能演化的一个空间投影。对于城市功能,传统的研究方法常常立足于其产业结构的变化,但产业的空间分布,也就是功能区域的形成和发展,常常也是其城市功能的重要反映。

具体而言,本书主要回答如下几个问题:(1)上海生产者服务业空间分布及变迁的基本特征和规律是什么?(2)与其他国际大都市相比上海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何在?(3)生产者服务业增长与集聚的内在机理是什么?如何理解其在大都市特别是中心城区表现出的高度集聚性?(4)上海生产者服务业的集聚与增长是如何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展开的?(5)上海生产者服务业的集聚发展是如何推动上海城市功能转型和重塑的?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什么?作用的机理机制是什么?演化的可能路径是怎样的?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普遍认为,生产者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s)是一种中间投入,但这一定义几乎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事实上,迄今为止,关于生产者服务业的内涵仍存在较大的模糊性(Coffey, 2000),现有的研究都是从外延的角度来界定这一概念的。目前来看,经常为学界采用的类似概念有:商务服务业(business services),指的是包括律师、会计师、广告、咨询、信息服务、物流、安保等一大批专门或主要为企业和机构(非个人)提供辅助性服务的行业^①; FIRE 产业,

^① 也有一些学者将这类产业称为“producer services”,比如 Coffey 等(1996), Elliott(2005)。

即金融、保险和房地产,这是 Sassen(2001)等学者在研究世界城市功能时主要观察和研究的行业类别;知识密集型商务服务业(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简称 KIBS),其含义同样较为模糊,大体上包括商务服务业中创造、传递信息和知识的行业,采用这一概念的学者包括 Muller 等(2001)、Hertog(2000)等;高等级服务业(high-order services)(Coffey et al., 1996)和先进生产者服务业(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简称 APS)(Bailly, 1995; Moullaer and Gallouj, 1993),其范围大体上包括了商务服务业和 FIRE 产业中以加工、处理和传递信息为主的行业。

本书所研究的生产者服务业,采用了格鲁伯和沃克(1993)的分类,指的是包括商务服务业和 FIRE 产业在内的一个大的行业集合,与其相对应的分别是消费者服务业(consumer services)和政府服务业。而其他所有关于商务服务业、高等级服务业、先进服务业以及知识密集型商务服务业的研究均被看作是与本书相关的研究。

生产者服务业空间集聚大体上属于产业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的交叉领域,因此这两个领域的一些基础性文献,尽管与集聚主题并不直接相关,但仍然构成了本项研究必需的理论基础。对于这样的研究,本书将在正文中有针对性地予以阐述,这里不再展开或只作简单的总结性论述。

一、关于生产者服务业性质、内涵及功能的研究

这一部分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生产者服务业的性质、内涵及其功能得到了多角度的、全面深入的挖掘和阐释,形成了许多重要的基本共识。研究的视角基本上立足于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分别从增长和发展现状、生产效率、绩效水平、竞争优势、外部效应、创新环境、产业结构、产业组织等方面对生产者服务业作全面的解读,主要代表人物和文献包括 Francois(1990)、Eswaran 和 Kotwal(2002)、格鲁伯和沃克(1993)、Katouzian(1970)、O'Farrell(1995)、Muller 和 Zenker(2001)、Hertog(2000)、Keeble 和 Nachum(2002)、Capello(1999)、Esparza 和 Krmnec(1994)、Coffey(2002)、Tschetter(1987)、Marshall(1994)、Wood(1991)、Fernandez(2001)、Coffey 和 Bailly(1991)、Scott(1988)、Beyers 和 Lindahl(1996a, b)、Lindahl 和 Beyers(1999)、Bryson、

Keeble 和 Wood(1997)、Sharpe(2000)、Zagler(2002)等,而 Coffey(1995)、Daniels(1995)和 Harrington(1995a, b)等都对生产者服务业的相关研究有过详细的综述。总括起来,这些研究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两大主要视角,一个是弹性生产体系的建立,一个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外包(contracting out、unbundling 或 outsourcing)^①。生产者服务业的增长根源于发达国家在由工业经济转向服务经济后社会生产体系和生产方式所发生的革命性变革,是发达市场国家的生产组织结构面对全球化、信息化以及法律和制度变迁所进行的主动和被动的调整,调整的结果,发达国家制造业总量及比重出现了大幅的下降,但这绝不意味着其制造业出现了衰退。相反,笔者更愿意相信这是其制造业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的反映,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产品进入成熟期,跨国企业往往将其转移到更具生产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而自身则专注于新产品和技术的开发,专注于品牌和市场网络的建设和维护,从而能够通过技术标准 and 品牌来获得高额的利润回报。其二,相应地,跨国企业的研发能力进一步增强,它同发展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差距反而在进一步拉大。其三,发达国家同以前相比,在商品消费的绝对量上并没有减少,反而是享受到更为丰富的、更加低廉的商品集。而强大的生产者服务业则是这种生产体系和生产方式得以顺利进行的基本保证。限于主题这里不能展开,但这些成果构成了本研究的基本理论支撑。

二、生产者服务业集聚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生产者服务业的产业集聚大体上有两种研究视角:其一,集聚的一般性理论研究。该类研究并不对集聚的空间特征作过多的实证分析,其关注的焦点是产业是如何集聚的,集聚的原因何在,动力是什么,集聚的功能、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可能对其产生影响的条件变量是什么,等等。其二,集聚的空间特征研究(笔者将其称为区位理论研究)。该类研究侧重于产业集聚的实证分析,其关注的焦点是产业在何处形成集聚,为什么在此地而非彼地形成集聚,影响集聚的因素是什么,集聚区域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延伸开来,这种集聚形

^① 严格来讲,contracting out 和 unbundling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详细分析见 O'Farrell(1995)和 Tschetter(1987)。

态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关系怎样,它们是如何制约城市功能,或者是如何促进城市功能转型的。从空间角度而言,第二种研究一般又可分为全球视角、国家/区域视角和城市视角。但严格来讲,这两类研究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往往是综合在一起进行的,只不过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

1. 关于一般性集聚理论的研究

Marshall 是最早对产业集聚现象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家之一(Fujita and Krugman, 2004),他提出的产业区(industrial districts)形成的三因素论(知识溢出、专业化的劳动力市场以及产业关联)已经广为人知,成为产业集聚理论的基石。而以 Krugman、Fujita 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理论经济学家(藤田昌久、保罗·克鲁格曼、安东尼·J. 维纳布尔斯,2005;克鲁格曼,2007;Fujita and Krugman, 2004; Ota and Fujita, 1993; Fujita and Thisse, 2002)在 Marshall 研究的基础上对产业集聚和产业空间进行了开创性的拓展,并把空间集聚的理论研究带入主流经济学的殿堂。尽管上述研究是以制造业为研究对象的,或者说其理论主要是用来解释制造业空间分布和集聚现象的,但他们提出的离心力和向心力模型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涵,其理论内核同样成为研究生产者服务业集聚的重要基准点。

Markusen 在 Marshall 研究的基础上从另外一个视角进行了重要的拓展。他关注的焦点是产业集聚区的类型划分以及不同类型的集聚区所分别具有的性质和发展潜力。他按照企业规模、供求联系、市场导向(内部的还是外部的)和规模经济的程度四个指标把产业集聚区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马歇尔的新产业区(Marshallian new industrial district)、中心—辐射型集聚区(Hub-and-Spoke)、卫星平台型集聚区(satellite platform)和锚型集聚区(state-anchored),并分别对这四种类型集聚区的特性作了归纳然后给出了理论上的解释(Pandit and Cook, 2003; Yehua Dennis Wei and Chi Kin Leung, 2005)。该研究对于深刻理解集聚区与城市和区域发展、集聚区的内在发展潜力等重要问题都提供了很好的视角。同 Marshall 的集聚理论一样,Markusen 的研究同样是以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的,但其核心思想依然可适用于生产者服务业,并为 Pandit 和 Cook(2003)以及 Taylor 和 Beaverstock 等(2003)在研究英国和伦敦金融产业集聚时所采用。

而 O'Hara(1977)及 Ota 和 Fujita(1993)则沿袭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对生产者服务业在城市空间内部的分布进行了研究,前者主要考虑了交通成本,而后者则在此基础上又加入了通讯成本,但二者的基本结论几乎相差无几,只不过表述上略有不同。其基本结论都是:专业化程度高并且面对面对面接触要求较高的企业集聚在 CBD,而其他类型的企业则分布在郊区。

Scott(1988)从组织效率和核心竞争能力入手研究生产者服务业的集聚。作者认为,后福特制使得企业开始关注更为具体的生产环节,也就是进一步增强其核心竞争力。这样,企业把不相关的技术、部门转移出去,释放出蕴含在其中的可能的风险。而这些被转移出去的部门以商务服务业为主,现在被广泛地称为服务业外包。更重要的是,由此形成的弹性生产体系是理解服务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关键(Wood, 1991; Preey, 1998)。总体而言,服务外包和弹性生产体系要求企业同生产者服务业紧密接触,这样便产生了集聚的内在要求。

除了上述解释,大量的文献还对其他影响生产者服务业集聚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分析和探索。研究者普遍认为,生产者服务业产生集聚的原因与制造业有很大的不同,成本因素不再成为主要因素,比较重要的影响因素包括:面对面对面接触(Baro and Soy, 1993; Clapp, 1980; Sassen, 2001; Coffey et al., 1996)、外部收益递增(Keeble and Nachum, 2001; Gordon and McCann, 2000)、形成非正式网络和协作,从而获得新的知识和信息(Keeble and Nachum, 2001)。而 Gaspar 和 Glaeser(1998)、Esparza 和 Krmnec(1994)则认为信息技术革命对生产者服务业的空间集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信息技术在促使某些产业和部门离开集聚区的同时,也增加了另外一部分行业 and 部门频繁接触的必要性 and 可能性,由此对集聚产生一种双重性的影响。

除了上面一般性的集聚理论以外,还有一些研究是针对某一特定产业的。这类研究更关注集聚的性质和功能、集聚的竞争能力以及发展方向,较为重要的研究文献包括:Berghe 和 Verweie(2000)从金融规制的角度研究了金融产业集聚的原因及影响因素;Taylor、Beaverstock 和 Cook 等(2003)对伦敦金融产业集聚的优势和劣势、主要竞争能力、影响集聚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作了深入而翔实的研究;Fisher Associates(2004)研究了伦敦航运产业集聚的特点和规

模,并分别研究了各个子行业所具有的不同的竞争优势和竞争劣势。

2. 全球视角下的生产者服务业集聚研究

Daniels 用城市化经济和地方化经济的双重效应来解释服务企业在全球空间内的集聚。他认为,服务企业为了追求交通、通讯设施、住房和商务楼宇以及多元化的劳动力需要集聚在城市内(城市化经济),而为了降低不确定性需要同类似的企业集聚在一起(地方化经济),这两种效应使得服务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往往采取“跟随战略”(follow-the-leader),即跟随目标客户和行业内的标杆性企业,从而使得这些企业更主要地集聚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内(Daniels, 1993)。Daniels 事实上是在用主导型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它们更偏爱大都市)来解释整体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而 Sassen 则从生产者服务企业的功能入手来研究其在全球空间内的分布。Sassen(2001)在其极具影响力的关于全球城市研究的著作中,对纽约、东京、伦敦的生产者服务业的集聚特征作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一个假说性的命题,即在全球化背景下,生产者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会计、广告、咨询等高等级的生产者服务业会高度集聚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全球城市内。作者对此的解释是,全球化所导致的经济活动的分散化使得强化中心控制与管理功能的必要性大大增加,由此,承担中心控制功能的高级生产者服务业便高度集聚于全球城市之内。但 Sassen 的研究立足于全球城市的功能,即她的研究对象仅仅是高级生产者服务业中的大型跨国公司的分布,对于一般性的生产者服务业整体在全球的分布尚未给出较严格的实证和理论分析。

3. 国家(区域)视角下的生产者服务业集聚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较多,且多以实证和比较研究为主,并且绝大多数研究的视野局限在以北美和欧洲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内部。

Thompson(2004)对美国大都市区和非大都市区生产者服务业的集聚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该研究表明,以就业份额计,2002 年前者是后者的 2 倍以上,生产者服务业仍高度集聚于大都市地区。Cuadrado-Roura 等(1992)对西班牙三个最大城市生产者服务业的研究表明,高级的生产者服务业,往往以特别集中的方式在大都市区域内集聚和增长。Bennett 和 Graham¹ 等(1999)对英国商务服务业的实证研究同样表明,商务服务业在英国分布表现出高度

不均衡性,主要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几个中心城区内,其不均衡程度要高于其他产业。O'Connor 和 Hutton(1998)在对亚太地区生产者服务业进行研究后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即生产者服务业的空间分布主要集中在大城市,或者说是城市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和门户城市。而 OhUallachain 和 Reid(1991)通过对美国大都市生产者服务业集聚的动态性研究有了更深入地发现,1976~1986 的 10 年间,尽管美国的商务和专业服务业的就业仍高度集聚在纽约、洛杉矶、芝加哥等较大的大都市区,但其比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与此同时,非大都市区的生产者服务业就业却出现了迅速的增长,而一些像底特律、丹佛、达拉斯、波士顿等规模较小的大都市区其商务和专业服务业则表现出温和增长的态势。

类似的研究还包括 Yusuf 等(2005)对东亚地区、Keeble 和 Nachum(2001)对伦敦以及英格兰南部地区的研究。总体来看,这一方面的实证研究较为充分,结论也比较一致,生产者服务业高度集聚于大都市区已经被看作是一种程式化事实(Coffey, Drolet and Polese, 1996),但集聚与分散共存也是一个普遍的特征。

除了对生产者服务业整体进行研究以外,还有部分学者对某一行业的空间集聚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实证和比较研究,该类研究的主旨在于通过实证分析提出某一假说,或者对其他研究中提出的假说进行证实或证伪。

Pandit、Cook 和 Swann(2002)通过对英国广播产业(Broadcasting)和金融产业的比较分析,认为两类产业的集聚与增长有显著的相关效应:集聚区域的在位企业的增长率往往要高于平均企业的增长率,而这又会诱使一个新企业的进入,这种集聚区竞争优势的源泉来自企业在地理上的毗邻。但另一方面,研究也表明,与其他行业的企业集聚在一起并不一定能使企业受益,拥挤所带来的成本会抑制集聚的规模效应。

Pandit 和 Cook(2002)对英国金融产业的空间分布作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产业在英国的分布表现出高度不均衡的特征,伦敦以及东南地区占有 50% 以上的金融企业;而在区域或城市内部,分布同样高度的不均衡,伦敦金融产业主要集聚在金融城(City)和 Canary Wharf^①,而苏格兰的金融产业主要

① 即伦敦另一个 CBD 道克兰所在的区。